

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

探究其在大中華區的貢獻

林耀堂¹、梁潔芬

本文旨在討論大中華地區（即台、港、澳、大陸四地）自1925年迄今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之發展，並較多著墨於台灣部分，包括輔仁大學（尤以士林哲學與管理學見長，並透過輔大醫院實踐天主教會對生命倫理的關懷）、靜宜大學（尤以食物科學和營養學見著，並藉由服務學習推動社會企業之實踐）、文藻外語大學（其外語教育及校園國際化的學習成效，備受各界肯定）。台灣三所天主教大學各有其特色、肩負特別的使命，且有與眾不同之舉措，故詳加討論，以代表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在大中華地區的特別貢獻。

一、前言

在中國近代史上，左派史學家曾不遺餘力地撻伐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外國傳教士，主要譴責他們勾結帝國主義的勢力瓜分中國領土，使它成為半殖民地。² 但事實上，這些傳教士（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為中國社會帶來兩項重大的貢獻，徹底改變原有的社會經濟與社會秩序。首先，是引進西方高等教育

¹ 本文作者：林耀堂，國立台南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現任文藻外語大學副教授兼教務長，專長高等教育學生事務、全人教育與天主教高等教育理論與實務等。

²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2004）。

的發展模式，包括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帶動社會大眾起而追求「賽先生」、「德小姐」的知識，並為近代中國奠定現代化教育發展之基礎。其次，是引進西方醫療技術與醫學教育，且建置醫院，提高和擴展中國原有的醫療水準。³ 誠如《大學》談及高等教育之目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至善，意指一個人經由教育的過程，學得為人處世之道，並提供社會出類拔萃的貢獻；此般理想乃是知識份子求學授業不可或缺之指導原則。

二、在華傳教士與高等教育

明末著名的耶穌會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S.J., 1552~1610）來華，他與當時的高官及知識份子，如徐光啓（1562~1633）、李之藻（1571~1630）和楊廷筠（1562~1627）等人合作，將外文的科學、農學、天文等書籍翻譯成中文，向國人介紹此新知識內容，此為引進西方高等教育之前奏。以徐光啓《農政全書》將西方的農耕技術，輔以利瑪竇《泰西水法》為例，成功地先向朝廷介紹，再向社會大眾推廣，新式的農耕技術，普遍為全國農夫所熟讀，大幅提高農業的產量。當時除天文學保留給朝廷獨用

³ M. B.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W. P.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Grand Rapids, Michigan: Wm. B. Eerdmans, 1976); Ng, Tze-ming, *Christianity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China*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3).

外，數學、地理、地質學和曆法等新學科，則由傳教士按部就班地介紹給當時的高等教育學府，如清代的太學與翰林院。

及至國民政府的階段（1912~1949），教授新式課程的新學堂取代以往重視四書五經的私塾。當利瑪竇和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合作藉翻譯介紹西學之際，引起國內學術界的好奇，他們也向利瑪竇的同伴研習問道。⁴ 傳教士與知識份子起於文化上的交流，繼而轉為宗教上的交流；最後，中國知識份子幫忙傳教士將天主教的教義，從拉丁文與其他歐洲語言翻譯成中文書籍，作為在華傳教之用，如：由利瑪竇與徐光啓共同中譯，名為《天主實義》的教義書籍。

利瑪竇的傳教策略是以中國知識份子為首要對象；當他們與利氏交流後，對他的宗教信仰也開始感到興趣，逐漸地，遂被天主教會所吸引。利氏可謂藉由傳授高科技與新科學知識的過程，展開其傳教工作。

清代時期的傳教士已將西學東傳，但傳統的中式教育仍根深蒂固地存於基層的老百姓之間，即由私塾開始，國家以重重關卡的考試機制，選取人才進入官府系統，以治理龐大的帝國。當時求學與考試的內容，是以儒家思想學說為主。

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三所天主教大學和其他基督教大學與國立大學，如雨後春筍遍布全國各大城市。但當清末光緒皇帝（1871~1908）在慈禧太后（1835~1908）垂簾聽政下，中國

⁴ 穆啓蒙著，侯景文譯，《中國天主教史》（台北：光啓文化，1981）。

朝廷內部歷經維新失敗的戊戌政變和義和團之亂（1899~1901），這個時期開始廢科舉；隨之而來，是國民政府取代清朝愛新覺羅氏的統治，並推行「新生活運動」（1934）。當中國人民面對一連串的政治變革，舊社會被迫急速地蛻變成新社會的痛苦過程中，知識份子希望更多與現代化（即西化）有關的元素；期使舊秩序摒棄後、新秩序代之而生的是富國強民。⁵

就在中國社會經歷深度變化的過程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把握機會，發展教會傳統的高等教育，藉此訓練具有新知識、且有福音價值觀的知識份子去領導社會。⁶或許傳教士在辦理高等教育機構時，他們對於傳教的興趣，更勝於傳授科學知識與培養知識份子；但一旦傳教士大張旗鼓地強調「全人」教育，這在傳統國人心中，很容易被稱為是帝國主義前驅的基督教會，藉此進行如假包換的文化侵略。因為儒家學說已有一套持之以恆，即先明明德、後親民、最後止於至善的教育理論，為何還需要一套舶來品的高等教育理論？

當國民政府於1912取代清朝的統治時，教育界提倡德、

⁵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19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J. K. Fairbank and E. O. Reichauer,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⁶ 何曉夏、史靜竇，《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1996）。

智、體、群、美五育，是新政權下的教育圭臬。本文旨在討論大中華地區（即台、港、澳、大陸四地）自 1925 年迄今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之發展，並較多著墨於台灣部分，因它有其特色，並負特別的使命，且有與眾不同之舉措，故詳加討論，以代表天主教高等教育在大中華地區的特別貢獻。

三、天主教高等教育的目標

Starkloff 認為，天主教高等教育與今日其他高等教育的所有形式並無不同，但它獨特的性質則需要更廣泛、更根本的分析，綜合而言，應該包括基礎議題、行政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等三部分。⁷

第一，關於基礎議題部分，今日高等教育領導者的「哲學」，面對諸多嚴峻的挑戰，即強調「務實要求」（pragmatic demands）、而較少關注倫理與精神的價值觀；再者，關於天主教高等教育的身分與使命議題，從以往殖民時期到今日的轉變，可發現天主教高等教育持續在世俗化與排他性的天主教傳統中之奮鬥。

第二，有關行政管理的部分，當前教會團體領導者的最嚴肅問題，首要是權力的部分，目前已從專職的教會人士，交由平信徒所組成的董事會來負責；伴隨此權責轉移而來的，是平信徒能否保持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的立校原則，以及梵蒂岡與教會聖統制未來所扮演的角色。

⁷ T. C. Hunt,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Charlotte: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3).

第三，有關人力資源的部分，教師是學校最核心的因素，他們可以成爲只是扮演傳授知識的「專家」，也可以扮演教育學生專業知識與人生價值觀的「媒介者」，更可以是帶領學生將其學習成果擴大爲服務社會大眾的「見證者」，箇中端視教師發展如何看待並發揮自我的角色與功能。

爲培育學生具備未來在職場上所需專業領域的知識、技能，並發揮其潛能、增長知識判斷的能力，確實成爲當代高等教育機構的共同目標。同時美學方面的培育，包括創造力、想像力、音樂、文學、詩詞與戲劇的欣賞能力等，都有助於學生發展成爲一個完整的人，這也是全人教育的主要內涵。

然而，天主教高等教育同時也負有超性幅度的培育需求，即在福音價值觀的架構中，提供學生靈性發展之需，以朝向全人的發展。⁸ 但若以非基督宗教文化爲主導的台灣社會爲例，高等教育治理如何融入「超性」(transcendental)的思維，進而與各界分享藉由超性思維，發展出有別於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的實踐路徑，成爲一個「以傳播福音爲目標的教育團體」⁹，這不僅是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的使命，更是其挑戰。

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的「超性」內涵，可以軟、硬體兩方面爲例：硬體方面包括校園內的十字架、教會聖人的塑像、信

⁸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原著於 1852 年出版。

⁹ 2015 年 11 月教廷教育部於羅馬召開 World Congress on Catholic Education 時，大會對於全球天主教學校的期待。

仰的象徵物、教堂空間的建置，以及教室空間的布置等，來幫助師生感受到心靈的平安與和諧。軟體方面為規劃校核心課程，教學內容著重幫助學生身、心、靈的發展與整合，尤重倫理道德與人格培育的全人教育課程。¹⁰ 另外，教會學校除設有一般學校的諮商輔導室外，通常還設置宗教輔導室（中心）或生命教育中心，該處室（中心）主要為提供師生在精神層面的需求，尤其強調靈性修習之培育；為此，天主教高等教育包含的「超性」幅度，亦可以「宗教教育」表達之。此有助於師生理解及體驗形而下的一切並非人類生命的最終歸宿，而能在個人的學習過程中，培養對於「超性」或「靈性」事務的意識與經驗。

若就組織文化而言，在現有的相關法令與規範下，台灣三所天主教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都有其無法全然實踐天主教高等教育理想之困境，此非為其找尋藉口，而是真實情況使然。現階段正面臨數十年來專職教會人士在各個校園裡建立、形塑的組織文化，如何繼續傳承下去之挑戰；尤其當專職教會人士大幅減少之際，天主教高等教育的組織文化，如仁愛與正義的福音訊息，還能在校園裡維繫多久？

四、大陸境內的天主教高等教育

民國初期成立了三所天主教大學，分別是 1903 年由法籍耶穌會士在上海徐家匯天文台舊址創辦「震旦學院」、1923 年直隸東南代牧區的法國耶穌會團體在天津成立「天津工商學院」，

¹⁰ 林耀堂，《開放性思維的天主教高等教育》（台南：聞道，2013）。

「輔仁大學」則是於 1925 年由英斂之（1867~1926）邀請美國本篤會在北京成立。

1949 年中國共產黨（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跟著蘇聯布爾什維克傳統在 1954 年第一部《憲法》的第 94 條明列，只有政府才有辦理教育權；¹¹ 在 1982 年和 1988 年修訂的憲法，第 36 條明列宗教不能染指教育。顯而易見，中國大陸的政治哲學，是無神論的馬列主義加上毛澤東思想，與有神論的宗教信仰是互為桎梏。輔以中共在傳統上非常依靠教育學習的過程，作為灌輸馬列毛主義與思想到全國各階層、甚至是目不識丁的農民之重要工具。它的教育方法，是將知識、技能、價值觀、信念等，藉著討論、教授、訓練與研究，傳給他人。當一黨專政的政權執政，想要建立一個嶄新共產主義的政權時，它忙於灌輸馬列主義，訓練大家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尤其不能讓與馬列主義相左的宗教團體「污染」下一代的思想成分。

五、香港天主教高等教育的發展

「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在歐洲的教育傳統中，是很受歡迎的教育理論，它強調小組教學，目的是訓練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聖紐曼（St.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樞機在其名著《大學精義》（*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中，將他在牛津大學的學習經驗，加上福音精神的色彩，主張大學教

¹¹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中國人大網》，取自：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育是要訓練具備誠信、真、善、美等德行的完人。誠信在天主教教育中有其特殊角色，即學生不只在學問與知識上出類拔萃，更需在專業上領導同儕，且以形而上的價值觀為依歸，在來生與至尊無對的上主為伍。¹²

1926 年，時值英屬殖民地的天主教香港監牧區師多敏（Domenico Pozzoni, P.I.M.E., 1861~1924）主教邀請愛爾蘭籍耶穌會士到香港開辦博雅學院，因當時只有官辦的香港大學，目的是訓練菁英能以純熟的英語，成為聰明伶俐、溫良恭順的人才，以協助殖民地官員管治香港。惟港英政府表面聲稱未有設置博雅學院的需要，因當時的香港尚未發展成為人口密集、商務頻繁的國際城市。但博雅教育既為培育具有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的優良公民，此「開竅式」的教育理想怎能在殖民地實施？怎可讓大學生畢業後擁有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甚至促使他們學習印度甘地（Gandhi, 1869~1948）的非暴力行動，向殖民地政府抗議？深謀遠慮的英國殖民政府可能同意嗎？

當這批飽學之士由愛爾蘭來到香港教會後，他們希望建立博雅學院的計畫為香港政府所阻，但政府以邀請這群耶穌會會士，永久擔任香港大學的一個男生宿舍（書院）——利瑪竇宿舍（書院）的舍監為補償，其餘原為博雅學院而預備的教授群，則轉至中學任教。1919 年，一名教友在港島開辦華仁書院，於 1924 年轉給耶穌會主辦，同年耶穌會又開辦九龍華仁書院。

¹²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由於當年耶穌會為開辦高等教育而準備的教授任教於中學的緣故，多年來培養出類拔萃的社會菁英，分執商界、政界、學界、法律界之牛耳。

例如香港法律界公認的一代宗師余叔韶（1922~2018）大律師，他是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香港大學法律系及法律學院的創辦人；他是天主教徒，早年在華仁書院受中學教育，在回憶錄《法訟趣聞：雪廠街九號的故事》中，他對耶穌會的神父有溫馨的記述。書評人認為最吸引人的地方，並非其機靈口才在法庭上滔滔雄辯而勝訴的經歷，而是在該回憶錄第三章描寫余氏在耶穌會門下的受業心得，這些德行出眾、才高八斗的耶穌會士，其春風化雨的教導，使他終生受用。¹³

另外，香港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1920~1973），出身自上海，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後在南京中央大學任英文系教授。在他領導香港天主教會期間（1968~1973），與中文大學創校董事會保持友善關係，繼而興起開辦教區博雅教育學院的念頭。經過多年奔走，聯絡港府往日牛津校友的高層官員，但他的創校計畫還是胎死腹中。¹⁴ 因當時香港政府倡導菁英教育，所以只計劃開辦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中文大學，為平衡以英文為主的香港大學，以因應 1970 年代開始膨脹的人口。

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天主教會內曾有建議將聖神修院、明愛護士學校，以及徐誠斌專上學院，這

¹³ 余叔韶著，胡簪雲譯，《法訟趣聞》（香港：香港大學，2002）。

¹⁴ 方豪，《徐誠斌主教殘簡》（台南：聞道，1977）。

三間大專院校整合成一所天主教大學。惟經過教區高層數度反覆討論仔細思量後，終以教區在經濟財務上無法獨力支撐一所私立大學，所以裹足不前；但改於中文大學的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內，由教區籌資成立「天主教研究中心」，作為無法創辦天主教大學之補償。

耶穌會中華省於 2011 年規劃在香港創辦博雅大學。這是集合全球 28 所耶穌會大學之力，成立籌備小組，開始遊說政府，以新界皇后山一幅地皮作校舍；2013 年 1 月接獲香港政府可以開辦專上學院的准許。2013 年 1 月 28 日籌備小組 24 位蜚聲國際的耶穌會學者，在香港舉辦兩天的研討會，向社會大眾介紹創辦博雅大學的整套計畫，強調此高等教育學府要為對抗貧窮、倡導正義，同時邀請國際友人實地參訪將來的校址皇后山。大會專題演講的嘉賓是 Georgetown University 和 Santa Clara University 的校長，Santa Clara 校長 Engh 神父，他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暢談學生學習社會正義相關議題的重要性，需包含實際探訪邊緣人士、露宿者和受虐者，以體驗貧病艱辛；如此直接與實際現狀互動的教育方式，不但改變學生的思想，更可改變他們的心境。

這所籌備中的博雅大學有 3 個學術領域：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數學與自然科學。天主教神學、倫理學和其他宗教學之探究亦包括在內。¹⁵ 建校初期需要四億元港幣，華仁書院在香

¹⁵ “Jesuit University Proposed in Hong Kong”, 23 February 2013, *Jesui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japc.net/content/>

港和海外的校友都樂見其成，踴躍捐助。¹⁶ 但 2015 年 5 月 7 日，籌備小組卻在毫無預警下，由主席周守仁神父（1959~）宣布籌備工作無限期擱置，並稱這決定是由耶穌會羅馬總部和總會長仔細考慮後宣布，所募善款皆予奉還。¹⁷

熟悉中國大陸政治文化者，根據當時北京的政治風向評論這事件，咸認為與香港的「大陸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香港的大陸化，就是自 1997 年香港回歸後，香港政府的政策取向轉變：在政治上依賴北京的意見，在經濟上依靠大陸的支援，在法律上仰賴人民代表大會對《基本法》的解釋，社會上對中國多點愛國之情。¹⁸ 但在北京眼中，耶穌會預計籌辦的這所大學之發展取向，極可能與「大陸化」政策背道而馳。還有在籌備小組的成員，包含耶穌會在美國頗負盛名的大學（Georgetown、

jesuit-university-proposed-hong-kong

¹⁶ S. B. Saum, "A New Jesuit University—in Hong Kong", *Santa Clara Magazine*, 1 May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u.edu/scm/article.cfm?c=15961>

¹⁷ Stephen Chow, "Father General of Hong Kong's Society of Jesus Pulls Plug on Proposed Jesuit Arts College in Sai Kung", *Education Post*, 7 May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cationpost.com.hk/z-hk/resources/education/150507-educatio-new-fathe-genera-o-hon-k-on--societ-o-jesu-pull-plu-o-propose-jesui-art-colleg-i-sa-kung>

¹⁸ Sonny Lo, "The Mainlandization and Decolonialization of Hong Kong: A Triumph of Convergence over Divergence with Mainland China.", Joseph Cheng e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its First Decad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pp.179~231.

Holy Cross、Santa Clara 及 Marquette) 的主要領導人，富有濃厚美式學術界的影響，日後這所新博雅大學，如果不依照北京當局的政策行事，其抗拒力道恐非容易應付，所以中共依其慣常做法，就消滅它於微時。

另有人主張，博雅大學胎死腹中的決定，乃因羅馬耶穌會最高領導階層受到壓力，故由居於羅馬的總會長出面喊停，將籌備計畫無限期擱置。加以香港天主教會因見到澳門天主教大學不太成功的例子，更認為大學在學術水準與課程質量上必須達到最高水準，才可回應全球化時代香港社會的要求與期待；至此，對這所大學未能實現的遺憾，就不再有負面之評論。

六、澳門的天主教高等教育

早於 1549 年，外籍傳教士即在澳門設立第一所西式大學，名為「聖保祿書院」¹⁹，目的是訓練遠渡重洋來遠東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它是葡萄牙政府保教權下的一種措施。該書院的學術課程包括主科，如神學、哲學、數學、地理、天文、音樂、藝術、拉丁文、葡文與中文等高等院校的科目。

聖保祿書院創辦之初就負有盛名，院內提供東方語言與文化見稱，又因是當時利瑪竇、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¹⁹ 聖保祿書院，葡文稱 San Paulo，書院旁邊附屬的教堂，澳門的華人據譯音稱之為「大三巴書院」和「大三巴教堂」。書院和教堂於 1835 年被一場大火焚毀，只有教堂門前的石壁仍倖存，稱為「大三巴牌坊」(the Ruin of San Paulo)，是近代澳門的地標。

S.J., 1591~1666)、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1688) 等無數傳教士初來乍到學習之地而國際馳名。在 1597 至 1762 年間，所有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都是先到澳門聖保祿書院學習中文後，繼續學習漢學。這所書院不但是當時遠東最大的修道院，亦是遠東第一所西式的高等學府。1762 年耶穌會因政治理由在歐洲被迫解散，在澳門的會士被葡萄牙人逐離澳門後，澳門天主教高等教育就告停頓，直到 1995 年才復甦。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 (Macau Inter-University Institute) 於 2009 年易名為「聖若瑟大學」。校際學院原由澳門天主教高等教育基金會開辦，隸屬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名下、由該大學管理；所以聖若瑟大學的校監，亦為葡萄牙天主教大學的校監，由其憲章得悉它是私立大學，直接受葡萄牙天主教大學管轄。²⁰ 澳門於 1999 年回歸中國大陸之前，澳門的葡人政府經由澳門基金會撥款四億澳幣作為開辦費用，目的是開辦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為主的博雅教育。依中葡協議的規定，當葡人於 1999 年離開澳門後，葡萄牙文化仍能保留在中國特別行政區（澳門）。

聖若瑟大學的行政組織取法於葡萄牙，其校長由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委任，²¹ 因此校內無論是行政管理或領導者，深受濃厚葡萄牙文化的影響。澳門行政首長何厚鏞 (1955~) 於 2000 年

²⁰ 參：聖若瑟大學官網：<http://www.usj.edu.mo/zh/>；或維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Saint_Joseph 的介紹。

²¹ Artigo. 12: Reito. Anexo, Estatutos do Instituto Inter-Universitario de Macau (澳門高等校際學院的葡文章程)。

受北京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1934~）之邀，在大學內開設宗教學系；2006年以天主教神學課程代替宗教學系，目的是服務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鄰近地區，為教會內的工作人員（即神父、修女、教理講授員等）提供天主教神學之培育。²²

劉柏年進一步告知外國記者，他將派大陸的神父、修女到澳門攻讀神學，以後就不需到香港教區的聖神修院了；事實上，此作法是公開地貶低香港教會的重要性。劉氏明知聖神修院的神學訓練擁有多年的基礎，絕對比將要開辦的澳門修院更有把握訓練日後的神職人員，但他偏向國際媒體公布捨香港而取澳門，實因香港天主教會存在與中共當局有異見的領導份子，不容於北京之故。

然而，在中梵的權力衝突脈絡中，聖若瑟大學的神學課程成為雙方意識型態衝突短兵相接之處。中方的政治操作可以滲入天主教的學術機構，導致天主教會的正統教導處於險境。因為聖若瑟大學重視與中方的合作關係，更勝於教會正統性是否受到保存，在此「置與中方合作於教會正統性之上」的思維下，它進一步招聘兩名共產黨員負責大學的領導層工作，為換取北京方面之資助。²³

澳門教會為大學之故，「置與中方合作於教會正統性之上」

²² 這消息由當時大學校長魯本文（Ruben de Freitas Cabral，1946~）宣布，由澳門一名資深神父所認定。

²³ 本文作者之一，於2006~2014年在澳門工作，對這兩位中共黨員知其姓名。

的說法，可由澳門天主教會高層的言論上獲得印證。因為這位神父²⁴表示，澳門教區在大學開辦神學課程的問題上，刻意繞過梵蒂岡當局的相關要求，而直接與葡萄牙大學聯繫。聖若瑟大學不願接受梵蒂岡監管其神學課程，乃因學校當局知道這課程無法為強調正統教義的教會高層所接納，但它卻為中共滲透教會提供一個機會與管道。

七、台灣：大中華地區天主教高等教育的代表

前述討論大陸與港澳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之後，更需對照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的發展脈絡，因為台灣是大中華地區相對容易實踐天主教高等教育理想的場域。自1950年代起，即由南京國民政府渡海來台（1949年）開始，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逐漸在大中華地區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後，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亟需推進教育以培養人才，所以1960年代的政策是優先鼓勵高等教育，以應付台灣急速起飛的經濟發展。因此國立政治大學、交通大學、私立東吳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和其他很多工業科技學院陸續成立，提供熟手和半熟手技工，促進台灣的經濟和工業發展。²⁵台灣天主教會團體名下的3所大學和3所專科學校，是大中華地區唯一提供天主教教育的財團法人。

²⁴ 本文作者之一，於2007年9月訪問這位澳門教區神父。

²⁵ 王淑端等編著，《台灣歷史與文化》（台北：新文京開發，2008）。

台灣天主教教育多年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面對天主教價值觀的實踐與現代社會之需要；尤其近代思潮流行的相對主義、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確實與基督信仰的社會訓導格格不入。然而，在台灣社會人士的心目中，3 所天主教大學皆有其特色與吸引人的優點。例如：輔仁大學是以士林哲學與管理學見長，並透過輔大醫院實踐天主教會對於生命倫理的關懷；靜宜大學則以食物科學和營養學見著，並藉由服務學習推動社會企業之實踐；文藻外語大學具有成績斐然的外語教育，校園國際化的學習成效備受各界肯定。

八、天主教輔仁大學的醫學院和醫療倫理教育

在 1990 年代，台灣高等教育正經歷蓬勃發展與競爭之際，輔仁大學也同樣致力回應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革的需求。因此在當時，成立醫學院、乃至創辦醫院，並非學校董事會的首要事務；因為就行政與經濟的角度而言，當時的輔仁大學並沒有足夠的資源。但 1992 年李震神父（1929~）繼羅光總主教（1911~2004）任輔大校長後，他在梵蒂岡為當時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1920~2005）所接見，教宗將與大陸建立橋樑關係的重任交給他。李震校長將教宗的囑咐通傳給董事會，就是教宗希望輔仁大學在天主教會倫理關懷的脈絡下，成立醫學院、興辦醫學教育。²⁶

²⁶ 這是由輔大前校長黎建球（1943~）當時陪同李震校長往梵蒂岡蒙教宗接見，談及創辦醫學院的問題。黎建球教授接受作者之

然而，大學開辦醫學院屬重大決定，因為這計畫牽涉非常沉重的經濟與人力資源負擔；當時，有 5 所私立大學有興趣開辦醫學教育，但因財務壓力遠不及國立大學有政府負擔經費，所以裹足不前。²⁷ 教宗的囑託是基於對中國大陸教會的關注，因對岸有關墮胎、避孕、代孕，以及人工生殖科技的問題與研究，都是天主教會醫學倫理關心的議題，教宗冀望透過台灣的醫學教育，能對大陸醫學倫理發揮示範與影響作用。

輔仁大學被選參與橋樑工作的角色，是為將天主教倫理藉醫學教育傳遞給大陸，因為環視大中華地區的兩岸四地，只有輔仁大學在學術研究的地位和以往的辦學成果，有能力擔當此橋樑重任。²⁸ 李震校長神父將教宗的囑託，轉告輔大董事會（其中包括 7 位教區主教與平信徒所組成）。董事會首先認為，醫學院的經濟負擔過度沉重，他們既不敢馬上拒絕教宗的「邀請」，又沒有經濟能力接受這個請柬，所以決意暫時將此計畫束諸高閣，實行拖延政策。數年後，當耶穌會士單國璽（1924~2012）樞機主教任董事長時，終決定負起開辦醫學院的重擔。²⁹

一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在台北訪問。

²⁷ 同上，黎建球教授在訪問時的憶述。

²⁸ 橋樑工作，是中梵關係非常熱門的談題。Beatrice Leung, "The Catholic Bridging Effort with China",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28.2 (2000), pp. 185~195; Beatrice Leung and Kuo Wen-ban, "Taiwan Catholic Bishops and the Bridging Endeavou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indy Yik-yi Chu, ed., *Catholicism in China, 1900-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69~187.

²⁹ 黎建球教授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在台北訪問時的憶述。

當時耶穌會士朱秉欣（1928~）神父扮演重要的角色。朱神父憶述當輔仁大學在台灣復校時，校長于斌（1901~1978）樞機希望輔大由復校時的 3 個學院增加至 10 個學院，但並未包括醫學院在內。當羅光總主教接任輔大校長時，天主教耕莘醫院院長姚宗鑑（1918~2012）神父率領台灣 7 所天主教醫院院長，聯名提出申請，希望輔大籌辦醫學院，目的是為提高台灣醫師及護理人員的醫德。因創辦醫學院需要龐大的經費，所幸建院經費三分之二由捐款人支援，三分之一由銀行貸款，建院工程終於順利完成。³⁰

但在招生方面，因教育部針對醫學院醫學系的招生人數有其政策之限制考量，又因輔大周圍已經有多所醫院：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省立台北醫院、台北縣立醫院、亞東醫院等，當時的病床數實已近飽和；於是 1990 年首先設立護理系與公共衛生學系，直至 2000 年醫學系才獲教育部核准正式成立。。

輔大成立醫學院之後，當時教育部曾要求醫學院需要有「附設醫院」，病人床位不得少於 500 床。於是朱神父開始著手附設醫院的籌劃，經過 4 年努力，卻在獲得建築執照、舉辦動土典禮、又支付建築師的費用後，籌建醫院仍然遭到否決。設置醫院與否，延宕 10 幾年後，學校董事會才無異議通過仍需籌建醫院，於 2010 年 1 月獲教育部核准設立附設醫院。

³⁰ 陳美琴，〈設定目標，勇往直前的長者 朱秉欣神父〉，《輔仁學派九十九學年度成果報告書》（台北：輔仁大學研究發展處，2011），172~175 頁。取自：<http://www.rdo.fju.edu.tw/sect/100/11.pdf>

一位任教於輔大醫學院的教授接受訪問時，暢談醫學系課程一步一腳印發展的經過。他強調醫學院傳授醫療倫理的重要性，也強調輔大醫學院單純教授理論的不足之處，必須付諸醫院內的臨床實踐醫療倫理，才是必要的。誠然，天主教醫學倫理可以講授，但臨床實踐更為重要；輔大醫學院主張的醫學倫理理論，需有可實踐的教學醫院為場域，才可收理論與實務相乘之成效。輔大醫學院的醫學教育理想，隨著 2017 年新建附設醫院的落成、營運，其被賦予對中國大陸發揮醫療倫理的「橋樑」影響作用，正剛開始。

然而 20 多年來，醫學院成立初期的財務狀況，因從零開始，幾乎傾全校資源給予醫學院。時間一久，醫學院獨占大部分資源而不容於其他學系師生，也導致醫學院的發展欠缺全校的支持，實屬遺憾。

九、靜宜大學

1932 年美籍陸靜宜 (Marie Gratia Luking, S.P., 1885~1964) 修女在河南省開封市設立靜宜女子中學。她在 1948 年到台灣後，努力奔走將這女子教育機構重新開設，終於在 1956 年獲教育部准許在台中復校為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1963 年升格改制為靜宜女子文理學院；1989 改名為靜宜女子大學；1993 年再改名為靜宜大學，兼收男女生。在台開辦的英語專科學校，由一名傑出女教育家何靜安博士 (1903~1979) 為首任校長 (1956~1957)，之後由龔士榮神父 (1912~2002) 接捧 (1957~1959)，再由蔡任漁神父 (1909~1995) 繼任之 (1959~1971)。自 1994 年開

始，靜宜大學開始由出類拔萃的平信徒學者領導。

靜宜大學位於台灣中部地區，所以其服務重點是為中部學生提供訓練，以配合該地域的工商業發展時的需要。該校現今繼續俞明德（1960~）擔任校長期間（2002~2010）所秉持的「全人陶成、專業領航」辦學理念，以「志工靜宜」為校園核心價值，培養學生具備卓越學識及社會責任感；創新設立的「服務學習」課程，讓靜宜成為全國志工學校的標竿。³¹

靜宜大學強調以真、善、美、道德的脈絡，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溝通能力，引導學生學習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尋求特別資訊、正確運用科技的知識。此核心教學理念，培養學生畢業前經歷跨領域的學科學習，轉化為將來就業的能力。換言之，靜宜大學藉「服務學習課程」強調人文精神、倫理關懷及志工服務，以培訓學生將來在職場中奉獻自己的專業所學。

誠如 M. J. Naughton 與 T. A. Bausch 的見解，天主教大學一方面想要恢復、並保存天主教高等教育的特質，另一方面又想要與當代文化建立合作的關係；因為當代的天主教高等教育已經不再只是為了宗教信仰的目的而存在，過去可由教會團體完全主導的運作模式也不復存在；更重要的是，即使教會官方文件在討論天主教高等教育的功能時，原則上也從如何對人類來世的關懷，轉為幫助個人更有能力去改善這個世界，亦即它在強

³¹ 參靜宜大學官網：<https://www.pu.edu.tw/>，及維基百科的介紹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D%9C%E5%AE%9C%E5%A4%A7%E5%AD%B8>

調「超性生活」(supernatural life)與「形而上的價值」(transcendental value)之重要性時，同時也意識到現世生活的必要性。³²

依此，能理解靜宜大學自2000年開始推動「志工靜宜」為核心價值的校園文化，辦理許多志工培訓課程，期望能涵養學生具有服務的情操，以及對於社會的責任感，融合道德、品格、知識等各層面的教育，進而實踐「進德修業」的校訓，展現天主教大學對社會的責任與對學生之教育使命。³³

靜宜大學透過系統化教學，發展全校性「服務學習」課程，規畫多元化社區服務型態，包括「社會福利」、「衛生醫療」、「文化教育」、「政府行政」、「資訊服務」及「社區服務」等。推展至今，結合校內專業教師參與課程之帶領，並與大台中地區數十個非營利機構，透過師生們的專業服務，一來具體實踐天主教會辦學重視的「超性生活」與「形而上的價值」，二來是回應志願服務的世界潮流。靜宜大學以「課程教學」與「課外活動」之相輔相成，更為大學生的情意教學建構了潛在學習環境。

學生在參與服務學習課程的過程，透過「認知面」學習如何傾聽、同理、說服、治癒、服侍他人；透過「意志面」增強

³² M. J. Naughton and T. A. Bausch, "The Integrity of a Catholic Management Educ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8.4 (1996), pp. 115~141.

³³ 〈志工靜宜·緣起〉, Volunteering Providence, 取自：
<http://www.service-learning.pu.edu.tw/VPUS.php>

對他人成長的承諾、建立社群、發展願景，以及前瞻性行爲；透過「技能面」則是建立學習與自我省思的生活習慣。一些特別規劃的服務學習方案，也有助於擴展學生的國際觀，並學習同理、善待弱勢族群之所需。

十、文藻外語大學³⁴

文藻是台灣唯一的外語大學，畢業生的外語能力與優良品格，頗受社會各界肯定。早於 1966 年，聖吳甦樂會申露德 (Marie de Lourdes Simon, O.S.U., 1898~1981) 修女應當時高雄教區鄭天祥總主教 (1922~1990) 邀請，有鑒於高雄當時為一新興工商業大都市，亟需推展大專教育，培養外語人才，於是籌設 5 年制外語專科學校。初期只招收女生，直到 1980 年始接收男生。為因應時代所需，1999 學年改制為「文藻外語學院」，成立二技部；2002 年招收日間部 4 年制學生。由於國際化的趨勢與華語學習的熱潮，首先成立應用華語文系，並陸續增設其他學系與研究所。2013 年通過改名「文藻外語大學」。創辦初期到 1992 年皆由修女擔任校長；自從 1992 年開始，平信徒陸續接手擔任校長。

文藻是由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修女所創辦，她們在世界各地已有辦理 400 多所教育機構的經驗，並將會祖聖安琪 (St.

³⁴ 文藻是國際性吳甦樂修女會修女創辦的教育機構，她們在全球 30 多個國家創辦不同等級的教育機構。吳甦樂的教育傳統，參閱文藻外語大學網站：<http://a001.wzu.edu.tw/category/6760>

Angela Merici, 1474~1540) 的精神與靈修意識嘗試融合於校園生活中。課程與教學的取向，是依吳甦樂教育傳統的訓練，強調個人成長的同時，也期許學生要服務社會與人群之所需。因為吳甦樂教育相信，每個人都是上主依自己的肖像而造成，教育旨在把學子身上原有的上主計畫中的真善美，從其內在性格顯示出來。這是學生進入全人教育之前的第一步訓練，期使他們能以智慧與明達面對未來的複雜生活。

1999 年文藻經過研究後，在學院部開設四個學分的「全人發展」課程，依「天、人、物、我」之課程架構，由八位老師協同授課，主題包括：尊重生命與終極關懷、生涯發展、思辯與選擇、兩性關係、國際人修養、職業倫理、正義與和平，以及信仰與人生。後於 2002 年，重新整合為生命倫理、家庭與婚姻、國際人修養、信仰與人生等四個單元。此課程以整合學生身心靈發展整體為目標，幫助學生內化並實踐其價值觀。

十一、台灣天主教大學的特色

因為天主教徒僅為台灣總人口數的 1%，順理成章地，在校內天主教學生人數非常少。台灣 3 所天主教大學屬私立性質，雖有政府的補助經費，但從學校經費的財務需求、教師教學與研究所需之資源而論，私立大學通常無法與公立大學相比擬。但由於天主教會是跨國的全球性組織，其傳教士人力資源可全球流動，靈活地互通有無。為此，這 3 所天主教大學創辦初期從國外帶來新式的教育理念與儀器設備、外籍教師人員，

開啓了天主教高等教育在台灣發展的黃金時期。

這些天主教大學透過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以不同的面向反映出天主教會對於教育的價值觀。香港與澳門天主教的各級教育工作者參訪台灣時，最有興趣學習「生命教育」的課程設計和教學實施。因為在全球華語區內，基督信仰談及的生命教育有其形而上的生命幅度（來世的生命），相較於僅論及此生的終結，提供永恆的空間與時間之遠景。

十二、台灣天主教大學的問題和挑戰

現實環境裡，當年因交通不便，台灣 3 所天主教大學分布於北中南，地理位置上天各一方。創校教會團體各忙己事，雖有互動，但教學與研究的實質合作並不多。未來應該如何加強合作，共同倡議天主教高等教育的辦學理念，並傳承創校教會團體的價值認同，都是當下的挑戰。

以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為例，宗教信仰和學術研究是可以並存不悖的，而為避免衝突，當某些議題尚未有成熟的研究成果之前，可先暫緩以宗教信仰的立場對該領域提出主張。例如，科學家可以任意從事複製人的研究；但天主教信仰主張生命的起源與創造是來自「上主的手」，而不是掌握在人手中，所以天主教科學家對複製人的相關研究有所保留。另外，天主教大學的領導階層，開始由神職人員與修會會士轉移到平信徒時，學校經營與管理也因此引發不同程度的張力關係。³⁵

³⁵ 這是一名前天主教大學校長的平信徒經驗之談，這位前校長在

台灣天主教大學有其特別之處，不單影響台灣社會，同時也擴大大陸與港澳地區，輔仁大學對醫學倫理的重視、靜宜大學推動學習服務與社會企業、文藻外語大學的全人教育課程，正是於教學、研究與服務等範疇實踐天主教高等教育的價值觀。

香港與澳門回歸中國大陸後，社會輿論於 2012 年指出，當地學校缺乏公民教育的課程與教學；不過，由香港特區政府所撰寫及推出的公民教育內容，卻遭到 14 個教育團體反對，也遭到成千上萬市民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港人認為這是北京政府向香港學生「洗腦」的課程。³⁶ 香港天主教會的中小學提議，由「生命教育」來代替「公民教育」；為撰寫「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香港與澳門的教會學校人士，絡繹不絕地來台灣向天主教大學取經，學習推動「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計畫，並亦成功地將其應用在天主教中小學。

天主教學校生命教育的特質與貢獻，首要是它對於「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的追求，此超越性的幅度是其差異化的特色；即使當一般學校也宣稱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時，天主教學校仍有其獨特性。再者，它更聚焦於系統化地培養社會公民所需的倫理道德與靈性發展之需求。

然而，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開

2016 年 2 月在台北接受作者訪問。

³⁶ “Groups Condemn ‘Brainwashing’ Textbook”, *Union of Catholic Asian News*, 31 July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ucanews.com/news/groups-condemn-brainwashing-textbook-/57180>

始面臨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專職教會人士大幅減少、後繼無人可擔任學校重要領導者的問題。當平信徒開始接手重要領導職務時，無可避免的問題是：宗教信仰是否干預學術自由？甚至連教職員都會質疑：平信徒領導者所強調的信仰培育，是否走在正確的路徑上？

新聘教師也是關乎學校如何保存天主教價值觀的議題。目前台灣高等教育機構普遍重視學術卓越，更勝於信仰價值的呈現；同樣，天主教大學雖屬私立性質，然其發展所需，與一般世俗大學並無二致，同樣得配合政府的政策，才可取得相關的財務補助。當然，這也是因為台灣的天主教大學在有限的財務資源下，大部分仍須依賴學雜費的收入與部分私人之捐款。

另外，台灣自 1970 年代以來，創造出經濟奇蹟，原先來自國外教會團體的捐款，也開始大幅減少。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正面臨如何繼續運用本身有限的資源去經營學校。

十三、天主教大學校園的靈性氛圍

當天主教大學進行全人發展的培育時，基督信仰強調人的「靈性」生活幅度之重要，實為所謂博雅教育的助手。尤其當天主教教育學者論及一般公立與私立大學，較少觸及的人生終極關懷議題時，信仰的氛圍特別重要。

以天主教大學所規劃的「生命教育」或「全人教育」課程為例，它是博雅教育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基督信仰的內涵，實與西方文明之發展相輔相成，當學生在修讀歷史與古典學科時，不僅是認識古代的事物，更是學習以古鑑今之能力。

另外，也有天主教學者提議將廣義的宗教信仰或靈性修為，如師生的「祈禱」與「禮儀」，作為校園生活不可或缺的學習活動。³⁷ 不過，在台灣的大學校園裡，強迫實施宗教信仰的理念與行動，會有違「大學法」之規定，更不是教育過程中的明智之舉。畢竟校園內教職員工生自然散發出福音價值、超群出眾的愛德行動與高潔情操，才是校園福傳的主要成功因素；特別是面對一些沒有正確答案的人生基本問題，須借助形而上的理解途徑，以期到達「超越者」那裡尋求答案。就如在天主教大學裡，教職員通常不太願意直接談論與天主教信仰有關的議題，但他們卻願意認同學校的辦學理念與福音精神，甚至認同創校教會團體的會祖之靈性修為與精神價值。

現階段台灣天主教大專院校前所未有的問題，就是神父、修女的聖召遞減，後繼無人；此現況使權力轉移已成普遍性發展，教會高等教育的領導必要轉到平信徒手中。³⁸ 此「典範轉移」，可能導致天主教高等育發展重點與取向的調整，尙待深入研究與探討，以規劃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路徑。

³⁷ M. W. Roche, *The Intellectual Appeal of Catholicism and the Idea of a Catholic University*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3).

³⁸ A. Gallin, "America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An Experience of Inculturation", William M. Shea and Daniel van Slyke eds., *Trying Times: Essay o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tlanta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99), pp. 99~119.

十四、總結

明末清初以來的外籍傳教士，藉由西式教育與教學法，為歷代的社會發展帶來極大貢獻。嶄新的高等教育學科內容，也為日後的政治經濟秩序與社會生活帶來偌大的革新。雖然傳統的習俗不容易改變，但在一般社會大眾心中仍有其崇高之地位。

天主教高等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最大不同之處，就是藉福音的教導去發展學生的靈性生命，繼而使他們邁向完滿、整全的人格。若比較天主教教育在台灣、大陸和港澳地區，衡量其天主教高等教育實施成效的話，則更突顯其價值與卓越之處。在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比較之下，赫然顯出台灣天主教高等教育有其無可取代的貢獻。

在香港殖民地時代與特區時期，縱然天主教會的中學仍是執全港教育界的牛耳，但天主教高等教育卻遲遲未能確立其發展地位。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後易名為聖若瑟大學）雖已於 1995 年成立，但由於中共黨員蟠踞學校領導高位，徒有天主教高等教育之虛名，實受中國共產黨強烈的影響。在 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後，所有天主教教育機構都收歸國有，天主教高等教育只能在少數的大陸神學院存在，且受中共嚴密的監控。天主教會得以在台灣開辦 3 所天主教大學，且各有特色，亦反映出創校教會團體相當程度的引導與見證功能。惟台灣社會近年受「少子化」的衝擊，高等教育在學生來源上面臨劇烈競爭，天主教高等教育如何進退有度、永續發展，更是需要從事研究的課題。